

生活流亡的奮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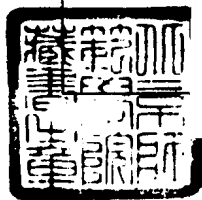
胡耐秋

K825.4/1

韬奋的流亡生活

胡耐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2704

752704

韬奋的流亡生活

胡耐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81,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

书号11002·536 定价0.39元

我自愧能力有限，不敢效法三十年來主張諸先
 輩努力於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民生之事業，竭盡
 最後全力以赴。雖然民族難救，苦危難甘，甘之如飴，此乃
 立敵後，研究研究，究目擊人民以作大鬥爭，使我久居所
 新中國先叩的未來，我口增加，為侯的勇氣和信心
 奮勉自勵，若我偉大祖國偉大人民繼續奮鬥，但
 三四年來，由於環境的壓迫，我也行動不能自由，最近更
 不幸以為經年呻吟，林莽不得，不時付諸心火，憤
 年未幾，我口不信，揮用，革命為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及進
 步，我事業呼喊，信守的工作，我個人，有免，于置業外
 但我心懷祖國，懷念同胞，苦思冥想，中夜待望，心所
 謂免，不敢不步，故強支為伴，以居地，希也，切勿心憤，提
 出我，皇身，最艱辛的問題，對內，對外，同胞，最誠，我
 懇切的呼籲，希共同奮鬥，起而，不可，挽此，老境
 保衛祖國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寓於高橋

楊杏佛

陷在墨迹：最后遗作《对国事的呼吁》

（一九四三年十月·上海）

靜養

(一九四三年十月·上海)

目 次

序 言	1
一、“雾”罩山城	14
二、推动宪政运动	20
三、为保障出版自由而斗争	28
四、进步文化堡垒横遭摧残	34
五、愤然出走	46
六、在旅途中	55
七、全家跟着走上流亡的道路	62
八、笔尖刺向法西斯	65
九、香港沦陷前后	74
一〇、去东江游击区	81
一一、山野草寮里的生活	89
一二、隐居在广东乡间	95

一三、顶风破浪去上海.....	106
一四、老太太提香篮伴送	111
一五、看到了祖国光明的前途	115
一六、同疾病苦斗	130
一七、党的深切的关怀.....	137
一八、提出庄严的要求.....	140
一九、光荣地被迫入党.....	145
二〇、这支笔要永远保持下去	151
后 记	158

序 言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一位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位从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典范人物。出生于一八九五年。他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在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英勇果敢，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

韬奋先生一生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办刊物，办书店，写书译书，他是一位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在青年时代，家境贫寒，靠他自己的努力在上海读了大学。在小学时期，就立志要做一个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当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开始主编《生活》周刊。他怀着一颗热爱人民，关怀青年，真挚而又火热的心，以全副精力投入编刊的工作。在每期的刊物上，他善于紧

紧抓住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实际问题，运用恳切热情而又理智明朗的笔调，写出动人心弦的评论文章，吸引和激励了广大的读者。他的评论文章篇幅不长，但是能说出人民心里的话，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凡是国家大事和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许许多多的读者都要看看韬奋是怎么说的。他除了每期在刊物上写文章而外，还认真负责地答复读者的来信，把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来信和复信在刊物上刊登，使得有同类性质问题或者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也受到启发。由于韬奋先生在编刊工作中树立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的销数从开始的两千多份，经过四、五年之后就猛增到十五万五千份以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广泛的信任。

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许多外地读者常来信并汇款托购书刊，也有读者来信诉说在汇款购买书刊方面受到了欺骗，韬奋先生和周刊社的同事商量，就决定在周刊社设立了书报代办部，为读者服务。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二年七月，又在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创办了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的成立，是韬奋先生一贯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进一步的实现。由于这个缘故，书店的邮购工作，在整个书店工作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出版书籍的

工作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出版首先要有资金，书店本身没有资本，也从未向社会上招股，它开头出版的图书，是利用《生活》周刊订户的预订费和替读者代办书报的预订预约费的存款作为出版资金的。除了经济上的这一条件而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在韬奋先生的思想逐渐转向进步的情况下，接受了一批进步著作家的大力支持。许多进步著作家向书店提供了各种进步内容的稿件；有些进步编著人参加了书店或者和书店合作，担任了书籍和期刊的编辑工作，使得生活书店逐渐地形成以出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读物和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出版方针。再有一个条件是要有一支有事业心的干部队伍。韬奋先生从来不任用私人，录用的职员和练习生，都以是否有事业心，能否苦干实干为标准。生活书店内部是一个合作社的组织，在经营管理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机构的成员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每一个职工对整个书店的工作都有发言权。书店职工都从菲薄的工资中提出很少量的数目作为参加合作社的股金。职工缴纳的股金从经济意义上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显示了他们在书店内部的主人翁地位。韬奋先生平时对同事的生活和思想教育都经常地加以关心。由于书店领导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有些人在工厂或其他出版单位已经是正式职员，但情愿

放弃原来的职务，前来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有的人还从练习生当起。书店的负责人和职工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职工的政治觉悟水平虽然有悬殊，但总的来讲，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韬奋先生的领导下，是一支能够同心协力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进行战斗的队伍。决不是象有的人污蔑的所谓“乌合之众”。

《生活》周刊的改革和生活书店的创办，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国内国际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他们不但对中国的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还进行文化“围剿”。但是，新生的革命力量绝不是反动势力能够镇压得住的。从文化方面来讲，当时全国广大的读者迫切地希望得到进步的读物，进步的作家需要有出版单位出版他们的著作，许多有志的青年愿意投身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就相应地力所能及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周刊和书店既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又转过来推动时代的进步，为反对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生活书店在整个的三十年代，可以称得起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而这个进步文化堡垒的中心人物就是邹韬奋先生。韬奋先生主持

的刊物和书店，所以能在革命中起积极的作用，是和他的政治立场、思想品质和创造精神分不开的。

下面，就来简单地谈谈韬奋先生思想的转变和发展的过程。

从一九二六年接办《生活》周刊到一九三三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禁，韬奋先生主编这个刊物历时七年。在这七年中间，刊物的内容有着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刊物的立场和言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初这个刊物只是偏重于对青年谈职业修养方面的问题，由韬奋先生接办以后，刊物逐渐涉及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韬奋先生在刊物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民族前途和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并且明确地指出：任何个人问题，都必须通过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这样，《生活》周刊就成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见和要求的进步刊物。

《生活》周刊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和韬奋先生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韬奋先生接办《生活》周刊的初期，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观察分析和解决的意见，还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但是韬奋先生是一个正视现实，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从现实中得到的教

训，引起了他思想上的转变。他有一篇文章，谈到他由于参加过职业指导运动而得到的教训。他说：“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使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见《经历》二四、《现实的教训》）他的这一段话说明他意识到思想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尤其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正是他正视现实的表现。

还有一个引起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少年和青年时代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在解放前的上海那个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亲眼看到许多中国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屈辱的事情，使他感到极大的不平。他参加社会工作以后，他的胸中始终装着“劳苦大众”，念念不忘要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他以这种思想作为出发点，就必然会促使他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究竟怎样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当他自己还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透彻的解答的时候，他就“请益于师友，商量于同志。”他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凡事不懂就问，他对同辈或者比他年轻的人，有时也对劳动人民，都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他还有着寻根究底的“彻底”

精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不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是不肯半途而废的。于是，他在实践中“且做且学，且学且做”，终于在他的思想上形成了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起来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斗争这样的意念。

韬奋先生自己有一段话最能说明刊物的转变和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他说：

“《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见《经历》二九、《转变》）。

韬奋先生既然有了这样的认识，以他真诚坦白的胸怀，要他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对阻碍社会进步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是办不到的。他在言论中集中地批评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和侵犯人民权利的法西斯政策，因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

正在这时，韬奋先生参加了蔡元培、宋庆龄先生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国民党反动派把韬奋先生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准备对他下

毒手。他被迫流亡海外，去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实地考察。

韬奋先生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启程去欧洲，于一九三五年八月由美国回国。他在海外历时两年多，精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实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他看清了世界大势。他认为要彻底解决“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办到这一层，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认为“中国是世界中的一环，中国自己说不上帝国主义，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以上引文均见《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从上面他对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来看，他的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他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了。

韬奋先生回国以后，正逢国内兴起蓬蓬勃勃的抗

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实际行动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后，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蒋介石曾派特务头目到上海找他谈判，以生命危险对他进行威胁，同时以官职对他进行引诱。他既不怕威胁，也不受引诱。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动员，共同抗日。国民党反动派痛恨在心，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将韬奋先生和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先生共七人逮捕入狱。经过法庭上面对面的斗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法院终于无法判处他们救国有罪。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们才获得自由。

韬奋先生在积极参加和领导救国运动的同时，继续编辑刊物，鼓吹全民动员，争取民族解放。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里，他也笔不停挥地写书。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他主编的刊物有《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周刊。在短短的时期内，他还和一些进步的编著人办过《生活日报》。这些报刊，随着救国运动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随着他的行踪所到之处，陆续在上海、武汉、重庆、